

「我不知道我應該說什麼故事——關於死亡還是愛情？也許兩者是一樣的？我該講哪一種？我們才剛結婚，連到商店買東西都還會牽手。我告訴他：『我愛你。』但當時我不知道自己有多愛他，我不知道……我們住在消防局的二樓宿舍，和三對年輕夫婦共用一間廚房，紅色的消防車就停在一樓。那是他的工作，我向來知道發生什麼事——他人在哪裡、他好不好。那天晚上我聽到聲響，探頭望向窗外。他看到我我就說：『把窗戶關上，回去睡覺。反應爐失火了，我馬上回來。』我沒有親眼看到爆炸，只看到火焰。所有東西都在發亮。火光冲天，煙霧瀰漫，熱氣逼人。他一直沒回來。」

——露德米拉·伊格納堅科，已故消防員維斯里·伊格納堅科遺孀
(《車諾比的悲鳴》)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資料圖片



阿列克謝耶維奇 面對苦難的復調悲語

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斯韋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名字，對許多人來說十分陌生，但她的著作《車諾比的悲鳴》(內地也譯作《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卻曾經觸動不少人的心靈。她新聞專業出身，擅長紀實寫作，往往通過翔實的採訪，把受訪者的聲音匯集在一起。這些來自第一現場的親身敘述，把歷史片段中面目模糊的個人重新點亮，每一把獨特的聲音都成為刺入苦難現實的鋒利刀刃。瑞典文學院對她的頒獎詞，也正強調了她作品中的「復調」特質。

旅俄翻譯家孫越，認為阿列克謝耶維奇其人其作都有「與別不同之處」，她的創作與時代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

由女性角度批判戰爭

阿列克謝耶維奇1948年出生於烏克蘭的斯坦尼斯拉沃夫，父親是白俄羅斯人，母親是烏克蘭人。父親退伍後，一家人遷往白俄羅斯。高中畢業後，阿列克謝耶維奇做過教師和記者，後來又在明斯克大學學習新聞專業。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否定了斯大林後，蘇聯文學進入了1956年至1966年的黃金十年，許多一線作家就是這時誕生，但這十年中並沒有她。」正如孫越所說，出生於1948年的阿列克謝耶維奇並沒有趕上蘇聯文學的高峰時期，她的第一本代表作《戰爭中沒有女性》(也譯作《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出版於1985年，但旋即引起了注意。「阿列克謝耶維奇是學新聞出身，在她1990年前創作豐盛的時期，很強調新聞、報刊通訊的特點。《戰》一書的走紅與她的學習方向、當時蘇聯對二戰的報道和觀點有很大關係。」

在《戰》一書中，阿列克謝耶維奇採訪了數百名參加過二戰的女性，記錄了戰場上的真實故事。這些女性眼中的戰爭，有着和男性截然不同的痛苦樣貌，讀來令人震撼。孫越認為，阿列克謝耶維奇記錄戰爭的角度和方式和當時的主流論述十分不同。當時的蘇聯官方，所推崇的是蘇聯現實主義文學的創作方法，「遵照高爾基1934年所提出的創作標準，要直接描寫社會主義現實、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如《這裡的黎明靜悄悄》的作者瓦西里耶夫等著名作家，都嚴謹地遵從這種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記者出身的阿列克謝耶維奇卻採用了截然不同的敘述方式，用女性的眼光、第一現場的報道，為讀者展現了當時新聞中少有看到的鏡頭，描繪出白俄羅斯在戰爭中所遭受的創傷，也觸及到一些蘇聯迴避報道的戰爭面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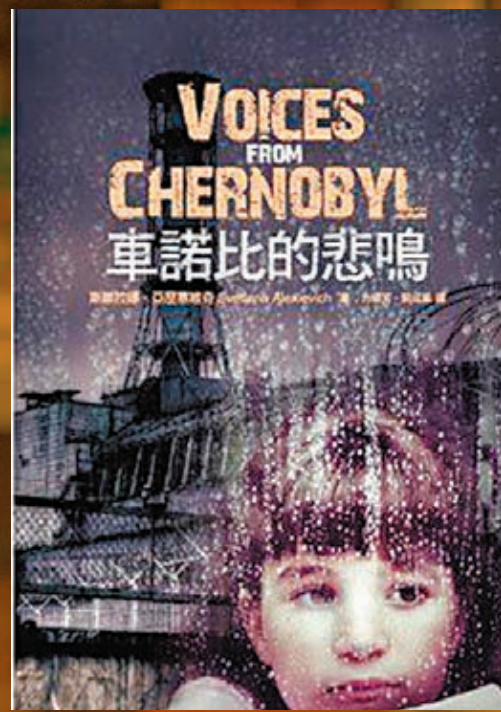
「然而在當時蘇聯的體制下，她無法將個人的價值觀明確表達。」孫越指出，「比如她作品中的女性思想。她認為戰爭毀滅人類，首先也摧毀女性。象徵着美麗與母性的女性，在戰爭中成為犧牲品，就算成為戰士，也要付出犧牲。她想要表達的其實是，即使是為了正義，戰爭也是醜陋而殘酷的。其終極想探討的，其實是人的生與死——生的意義何在？難道活着就是為了要在戰場上死去嗎？但這些潛台詞，在作品出版的那個年代，不能講，讀者只有在她後來的作品中得到進一步了解。」

勇敢出走

在孫越看來，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取向有其獨特之處，而她探索文學的道路，也有着與眾不同的選擇。「2000年，她離開白俄羅斯去歐洲，其實是選擇了自我流放，這成為她創作上一個很重要的節點。蘇聯解體後，政府對待作家的方式改變了，文學亦失去了在文化、文藝中的優先地位，這些可能都為她帶來很多失落。」他回憶多年前在莫斯科與阿列克謝耶維奇有過短暫的交流，當時這位作家曾提到，在蘇聯解體、社會走向市場經濟後，作家的很多思考、對靈魂價值和生與死的拷問，似乎都無人關注了。也許正因如此，在許多流亡作家紛紛選擇回歸的2000年前後，她卻選擇了流亡，前往意大利、法國、德國，寫出了新的作品。

「到歐洲後，她隨時寫，作品隨時就能被譯作當地的語言，這對她作品的傳播起了很大作用，也為她被提名諾貝爾獎創造了條件。更重要的是，流亡後，她更能旗幟鮮明地表達自己的價值觀。」孫越認為，阿列克謝耶維奇雖然是記者出身，但並不能稱為「時政作家」，「時政作家，要針砭現實，而在蘇聯的傳統中，記者和作家是分工的，記者報道事件，文學則更高遠。」但從1985年到2015年，阿列克謝耶維奇卻因為「出走」而完成了創作上的根本改變。「1985年時，只是披露二戰時白俄羅斯的悲慘，展現女性在戰爭中的面貌，以及她們的抗爭。但現在，作品雖仍然是紀實文學，但內容上有很大的變化。她的理念更高了，批判性更強了，關注人類的生存，那已經是哲學和宗教層面，超越了她之前時代的創作。」

瑞典學院評價阿列克謝耶維奇，說她的作品是「對時代的磨難與勇氣的紀念」。「的確是她一直在經歷着的。」孫越說，「她雖然沒有真的經歷戰爭，但經歷了蘇聯時期生活的痛苦；而她的出走，也正是勇敢的選擇。」



阿列克謝耶維奇 路透社

龍應台： 阿列克謝耶維奇 多重身份獲諾獎認可

台灣作家龍應台9日在臉書上表示，阿列克謝耶維奇獲諾貝爾文學獎，除了是對作家的勇敢和堅持予以鼓勵，同時是記者、社會學者、心理學家兼牧師第一次得到這樣高度的認可。

龍應台回想起2005年在柏林遇見阿列克謝耶維奇，那時柏林文學雜誌「Lettre International」一年一度的紀實文學獎進行決選，10個評審從世界各地飛到柏林聚會，評審都是資深作家，其中包括龍應台與阿列克謝耶維奇。

那時每個評審都要寫一段話，談對於紀實文學的看法，龍應台說，當時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一段話是「我一直在尋找一個寫作類型能夠讓我最貼近真實人生。現實像一個磁鐵吸着我，讓我痛苦又使我着迷。我要把它放在紙上。最後我選擇的類型是讓真人的聲音和懺悔，以及目擊者的證詞證物說話。」

阿列克謝耶維奇還說，「我就是這樣去看、去聽這個世界，眾人聲音的合唱和日常生活的細節匯聚……我必須同時是作家、記者、社會學者、心理學家兼牧師。」

因此，龍應台認為，阿列克謝耶維奇在2015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除了是對一個作家的勇敢和堅持予以鼓勵之外，比較特別的是，紀實文學的類型，不是小說、不是戲劇、不是詩歌，而作者「同時是記者、社會學者、心理學家兼牧師」，第一次得到這樣高度的認可。

文：中央社記者 鄭景雲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新版付梓

阿列克謝耶維奇首次出版於1985年的代表作《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近來推出最新簡體中文譯本，其譯者是鳳凰衛視資訊台執行總編輯呂寧思。

在「譯後記」中，呂寧思回憶道，三十多年前就曾在蘇聯《十月》文學雜誌上看到該作品，被深深吸引，而自己也曾匆匆翻譯過此書的第一版。這次推出的新版，則是根據莫斯科時代出版公司2013年的版本譯出，「從初版到新世紀修訂版，幾乎就是作者的重新創作，不僅增加了很多內容，更由於蘇聯從巨變到解體之後，作者把許多曾被報刊檢查部門禁止或被迫自我刪去的內容發表了出來，率直地寫出了戰爭期間和戰後相當一段時間都讓人噁心寒蟻的話題，比如戰爭的殘酷，戰爭中的女兵感情和男女關係，還有蘇聯軍人進入德國以後的一些個人行為，更有很多篇幅是作者本人懺悔錄式的思索和同有關部門的對話摘錄。」

呂寧思早年曾當過兵，曾先後在復旦和華東師範大學研讀歷史與俄羅斯文學，之後就戰新聞界，面對同是記者出身、擅長紀實寫作的阿列克謝耶維奇，他感到十分投契，亦十分欣賞她的創作風格。「她開創了一種獨特的文學體裁：政治音律的長篇懺悔錄，小人物在其中親身講述自己的命運，從小歷史中構建出大歷史。」

對於阿列克謝耶維奇奪得諾獎，呂寧思並不覺得意外，「諾貝爾文學獎不是給暢銷書頒獎，而是一向注重概念上的創新，一是創作手法上，一是精神內核上，一是現實批判上。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在這三點上都具備了。尤其是，在當下這個時代戰爭離我們並不遙遠，我們不應該停止對戰爭的反思。諾獎授予一個對戰爭有深刻描述的作家，顯然有着特別的意義。」

綜合報道